

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

景天魁

摘要：“社会学中国化”要从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实际”，转向立足中国实际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新阶段”的主要含义是：明确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起源，确认群学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根脉，建立真正“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解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彻底中国化”问题，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就必须：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引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第二，以群学古今贯通奠立本土学科基础；第三，以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会通重构学科体系；第四，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与世界人民共筑命运共同体，创造多元融通的世界社会学。可以说，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觉和学科自主。

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群学；“第二个结合”；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式现代化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25.02.00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史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两个结合”——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强调“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并且特别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① 这些重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的理论指南，也是把“社会学中国化”提升到新阶段的方向指引。长期以来，社会学在中国被称为“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被当成定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严重阻碍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今天，我们要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正本清源，明确学科根脉，认清正确路径，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对于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迈进新阶段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①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一、何谓“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

“社会学中国化”虽经反复讨论,但直到几年前,仍有人声称它是一个“伪问题”^①。即便是赞成“社会学中国化”的人,对它的理解也存在偏差。故而,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略作梳理,以便明确所谓“新阶段”的含义。

(一) 社会学中国化“吹响了学术改革的号角”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西化”潮流占据了巨大优势。对此,部分留学归国学者作出的重要回应,就是吴文藻等人发起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改革”。吴文藻“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指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当时的情况——引者注)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②他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提出了尖锐批评:“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当此期间,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③费孝通认为:“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④

吴文藻率先在教会大学里用中国语言讲授西洋社会学,当时竟被认为是“怪事”。此举“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⑤值得赞赏的是,正是留美归来的学者率先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这说明他们只是学了美国社会学,但并未被美国化,如果已经被美国化了,当然就会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伪问题’”了。

在教会学校,中国社会学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翻版。^⑥那些传播西方社会学的传教士们不了解中国传统学术,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中国是否也有本土的社会学。传教士们用西方社会学取代群学的初衷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推行文化殖民,只不过是传播基督教的外衣下进行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他们确实开创了用西方社会学取代群学的先例。至于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中国学者,从燕京大学当时的情况来看,按照费孝通的说法,吴文藻只能做他“当时能做到的”^⑦事情。换言之,在一所教会大学,想要给群学一席之地是不可能的。

(二) 社会学恢复重建是要对社会学本身进行改造和创新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1952年被取消的社会学得以在1979年恢复重建。这对于费孝通等老一代社会学家而言,是学术生命的“重生”。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恢复重建意味着什么?这并不仅仅是恢复建立一个学科,而是要回答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

① 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0页。

③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第3页。

④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页。

⑤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页。

⑥ 阎书钦:《移植与融会: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美国学术渊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⑦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页。

中国社会学，是恢复 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还是开创中国社会学的新局面？

一种意见认为，20 世纪前半期是社会学“走向繁荣”的时期，“为社会学在 1978 年（原文如此，应为 1979 年——引者注）恢复后迅速走向新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①。费孝通则认为：“社会学在中国，在我看来在解放前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正处于有人想改造的时候中断的，所以提到恢复这门学科时，我曾经认为它是先天不足。”^②“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与“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两种看法截然相反，何以如此？在深层意义上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解不同，“恢复重建”的目标不同，因而对 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所持的看法难免迥异。如果认为中国社会学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那么 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学人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社会学著作，办了多个社会学系，也按照西方社会学方法做了大量社会调查，这些成绩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必要的。此外，第一代留学归国的中国社会学家还敏锐地“思考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国情是否契合”的问题，^③ 20 世纪 30 年代，孙本文、吴文藻等社会学家率先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吴文藻还引入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领导开展深入的社区研究，形成了“中国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都是值得后人珍视的。

费孝通作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亲历者和重要贡献者，当然不是简单地否定已有的成绩，之所以称那时的社会学“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④，这不是抹杀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社会学家的贡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社会学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时代和发展阶段不同，任务也就不同。这是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对自己的学术经历能够进行深刻的反思，是杰出学者的必备品格。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中断了有二十多年。这是历史事实。而且正中断在它刚刚自觉地要改造成为一个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学科的时刻，社会学在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符合当前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因此不只是在大学里恢复一门学科，在大学里成立社会学系，而是要社会学本身进行改造和创新。”^⑤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作为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确定的目标不是延续和恢复 20 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而是“要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符合当前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可见，“恢复重建”实质上是要“改造和创新”。

改造什么，创新什么？如果“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仅仅是“联系中国实际”，那么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研究就已大体上做到了，费孝通“要社会学本身进行改造和创新”所指何来？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社会学中国化”。如果把“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应该肯定百年来几代社会学学人是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可观成绩的。但是，如果“中国化”进一步要求“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那就应该说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是“先天不足”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创新”。

“先天”何以“不足”？未必指的是“联系中国实际”不够，应该是指没有接续中国社会学的

①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增订本）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封后语。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17-18 页。

③ 周晓虹：《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江苏社会科学》2019 年第 6 期。

④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10 页。

⑤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17 页。

根脉。一个在中国无根的社会学,当然是“先天不足”的。如果放长历史尺度来看,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虽有一百二三十年了,但中国社会学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原因很多,特别是中国社会学曾被取消了27年,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是深刻的。今天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很有必要对此认真反思。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为了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首先是推进其更深入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这方面,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老前辈率先垂范,陆学艺、郑杭生率队勇进,带领社会学学人在社会学结合中国实际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即便如此,费孝通等前辈念兹在兹的依然是如何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深入发展。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重视“心态”研究、开展中国社会学起源研究、建设“人民社会学”、建设“美美与共”的美好社会,都是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深入开拓。遗憾的是,费孝通从1997年正式倡导“文化自觉”到2005年去世,在如此短暂的8年时间里,他的宏伟设想难以全部实现,他是带着遗憾和期待离开我们的。对中国社会学“改造和创新”的艰巨任务,如他所说,“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①。

(三)“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的含义

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不仅要求正确评价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学,还要反思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何以缺乏“理论自觉”——甚至陷入郑杭生批评的“日益深重的主体性危机”,^②更重要的是要深刻理解我们在新时代所承担的新任务。

1.“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是要明确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起源,确认群学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根脉,建立真正“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

1993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谈到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反思和总结“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一再提到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引者注)这门学科”,指出研究荀子群学关乎“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③这里的深刻含义值得我们认真体会。

一门在中国本土没有根的学科,怎么接地气,怎能有底气,如何茁壮成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学科也就罢了,我们既然有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为什么偏要漠视,甚至不予承认,非要把西方社会学当作正宗,甚至承认西方社会学的唯一性?“社会学中国化”只有解决这个本土根脉问题,才可能实现吴文藻等前辈所期望的“彻底中国化”。正如郑杭生所指出的,“避免种种‘无根’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觉’”^④。

2.“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是要解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彻底中国化”问题,形成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式社会学

1929年,吴文藻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任教,他发现当时一些教会大学所办的社会学系“处在模仿或照搬西方模式的状态”^⑤,指斥彼时的社会学是“半殖民地上的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44页。

② 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44页。

④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⑤ 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第596页。

怪胎”^①。到整整 80 年后的 2009 年，虽然社会学已经恢复重建 30 年了，郑杭生仍批评有些人还是没有“消除学界事实上还存在的学术被殖民心理”，仍然生搬硬套地“用西方的观点、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变”，他形象地形容那是“在西方的笼子中跳舞”。^②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这在当年的确是一大进步，但在今天已经远远不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表明，只是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难以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学。因为西方的概念与理论是从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实际中概括出来的，它们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如果把西方概念和理论看作“唯一普遍的公理”，即使与中国实际不符合，也不能怀疑和修正西方的概念与理论，反而将它奉为圭臬，据之“剪裁”中国的经验材料，那当然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概念和理论。即便是西方概念和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符合，那中国事实也不过充当了证实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材料，也难以产生中国特色的概念和理论。所以，尽管几代社会学学人非常努力地运用西方概念和理论做了大量经验调查，这些成果对于描述和了解中国社会很有价值，但所形成的中国特色概念和理论远不及预期。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冲破简单地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化”法。不是不可以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而是既要“化”实际，也要“化”理论；要先“化”理论，才能“化”实际。不解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再怎么努力地推动“中国化”，也超脱不出“西方化”的窠臼。可见，要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社会学中国化”就必须解决“化”理论的问题。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领军人物的费孝通，为什么到晚年发生了“转向”，他一生挚爱实地调查，对“行行重行行”乐此不疲，到了耄耋之年却致力于思考中国社会学的起源、扩展学科界限、增强文化自觉等理论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是自觉地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阶段，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现群学复兴亦即中国特色社会学崛起的阶段。因此，不能停留在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阶段上，而要经由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中西会通，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化”（检验、筛选、重塑）西方概念、命题和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引领下，形成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正如费孝通所说，拿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只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工作”^③，不是全部工作，更不是主要含义。费孝通晚年补课，补传统学术的课，就是要在传统学术中挖掘中国本土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就是率先垂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相结合。这绝对不是排斥或者轻视西方社会学，而是要致力于中西社会学在概念、命题和理论层面的会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由中国特色的概念、命题和理论构成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唯有如此，西方社会学才能真正在中国接地气，从而使自身得到充实和发展。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12 页。

② 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 12 页。

由上所述,“创新”什么的问题就可以有明确结论了,那就是创造新的辉煌——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要实现这个“创新”,“社会学中国化”就要解决用什么“化”实际的问题,要用理论“化”实际,就先要“化”理论。理论怎么“化”?费孝通晚年的伟大探索告诉我们,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学的起源问题、扩展学科界限问题、增强学科自信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今贯通”和“中西会通”。

(四)“社会学中国化”的阶段划分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阶段划分,以往有学者分得很细,仅仅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时间就分了四五个阶段。^①本文仅以是引进模仿还是自主创新为标准粗略划分阶段。严格地说,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是一个艰难的也是渐进的过程,即便在以引进模仿为主的阶段,也有不少的自主创新,很难以某个时间节点作为阶段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把“新阶段”定义为“自觉地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阶段,那么,将1997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开启的标志,应该是合理的。但是,郑杭生认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始自1995年,^②为什么郑杭生不把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概念的1997年而把1995年作为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标志性始点?他自己没有明确说明。笔者查阅《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5—1996)看到,1995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讲了关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再一次提到1993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过的话:“布朗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的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朗提醒我们,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种子……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种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③同年,在《开风气 育人才》等文章中,不论是否直接使用“文化自觉”概念,费孝通确实谈了许多关涉文化自觉的话题,郑杭生的意见是有根据的。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因为重视群学对于“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的特殊意义,所以愿意接受郑杭生的意见。

社会学中国化的自主创新阶段,也必定有一个从形成自觉意识、提出自觉主张到付诸自觉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有“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的细分阶段,先有必要的学术准备,才能进入正式的自主创新。所谓“准备”,一是做思想动员,二是明确本土学术基础,这是重要的准备工作。“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个性(即本土性)”,^④没有本土学术基础,也就谈不上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有了本土学术基础,然后才能进入正式的创新阶段。“正式迈进新阶段”的标志,应该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自主创新成果,其也许是陆续地也许是成批地涌现,对此不可轻言,只可由历史评说。对我们而言,“正式迈进新阶段”,需要的是埋头实干,是学界同仁尤其是年轻学者更富创造性的大胆探索和不懈努力。

① 韩明谟:《20世纪百年学案·社会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第12页。

② 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③ 费孝通:《讲课插话》,《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102页。

④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

“社会学中国化”的阶段划分，待“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充分展开以后，再来详细讨论不迟，目前宜粗不宜细。本文的重点还是探讨迈进“新阶段”的路径。

怎样才能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有哪些历史经验和现实依据可循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思想指引，明确群学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根脉，真正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相会通，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抓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机遇，走历史正确之路，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式社会学。

二、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引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0世纪初，与西方社会学凭借基督教取代式传播方式强势进入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甫传中国，就很快将群学作为落脚点，进而作为结合点。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就以其成功的实践提供了确证——与群学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扎下了根，而且使群学得到了提升，从而顺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一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为引领。

（一）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效果

与西方社会学的取代式传播方式及其信奉者声称“中国本无社会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早期传播者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与群学的重民、爱民、重群、群治观点高度契合。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很快形成了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有了这些核心内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他们称之为“唯物史观社会学”或“现代社会学”。李大钊指出：“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唯物史观——引者注），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①

相形之下，当时的西方社会学传播者却在坚称唯有自己从欧美学来的才是“正宗的”“纯正的”“正规的”社会学，而“以社会学为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以社会学为唯物史观或辩证法的研究者”，都是“以一种特殊研究混作社会学者”。^②以这样的态度自恃，就谈不上开放、包容了，而开放和包容是实现“会通”的必要前提。孙本文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凡例”中也宣称：“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种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③研究社会这样纷繁复杂的对象，应该秉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尊重各种视角和方法及其认识成果。硬要区分什么“纯正的”社会学、“混作的”社会学，哪里来的标准？无非是自我标榜，说到底就是唯有自己从西方学来的才是“正宗的”“纯正的”。以此种狭隘的眼界，还想知道中国社会学发展迟缓的原因及其现状，岂非枉然？“狭隘的眼界”就是中国社会学

①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42页。

②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第3页。

③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1，第2页，凡例。

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

缺乏开放和包容不仅是学科态度问题。因为自恃“纯正”，只能在书本上“联系实际”，不能付诸社会实践，殊不知任何实践都是复杂多变的，不可能如抽象理论那般“纯正”。所以，西方社会学受“中国本无社会学”态度的局限，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结合点，更找不到真正的实践主体——以工农为主的人民群众，这也是其难以顺利实现“彻底的中国化”的又一根本原因。而唯物史观社会学，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实践观点——不只是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群学的基本传统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因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够很快与群学相结合，并在中国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中深深扎根。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西方社会学若不能很好地解决与群学的结合问题，其理论自身就难以实现“中国化”，也就难以“化”实际，即难以真正“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因此，也就难以从中国实际中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的理论基点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群学诞生于战国末期——无论其创立者还是两千年历史上的继承者都未必是无产者，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与群学相结合？因为二者有契合性，而之所以契合是因为存在着若干共同点，这就使得二者具有结合的基础，以下是几个主要的理论结合点：

第一，由“民本”思想升华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共同的核心是“群”，这就决定了二者最佳的结合点就是“群”。中国自古就讲“以人为本”。《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①早在先秦就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②。群学主张“人生不能无群”，必须“明分使群”，“合群”是第一公理。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好比鱼水关系，苏区人民“送郎当红军”，解放区人民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类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反观国民党军队则是“抓壮丁”，一个是主动地“送”，一个是强迫地“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不同，因而胜败立判。

第二，由“民生为本”升华到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④，把“食”“货”置于基础性的优先地位，制约甚至决定排在后面的“祀”（祭祀）、“司空”（民事）、“司徒”（教民）、“司寇”（民法）、“师”（治军）。管子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⑤以上思想虽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高度，但有助于接受这一基本原理。这可由李大钊关于这一原理的论述而得到佐证：“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

① 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9，第434页。

② 李氏、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97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1页。

④ 李氏、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35页。

⑤ 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9，第2页。

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李大钊又说：“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这里所说的“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包括“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①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这里就是从“民生”出发，推导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可见，民生原理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理论逻辑上是相通的。

第三，由“士农工商”的群体结构分析升华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士农工商”指四种行业或职业人，也是社会地位高下的顺序排列。这一职业分层传统和分层方法，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很大区别，限于本文论域，这里不拟讨论，只简单分析由中国本土分层传统上升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便利性。

饶有趣味的是，中国式的职业分层传统不仅思想内涵极其丰富，而且在贯通古今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地赋予“四民”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特征——如果说管子讲“官四分”^③倡导四民分业，主要讲的是职业特征，那么唐代柳宗元的四民合作思想^④就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内涵，到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⑤，再到蔡元培的“四民皆工”^⑥，贯通古今两千多年，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四民皆工”，意谓不论劳心者劳力者，都是各尽所能、地位平等之“劳工”。蔡元培由此喊出“劳工神圣”，这虽然代表的是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劳工”一词却由均力合作的无政府主义概念演变为具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概念，进而转换为苏俄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李双、杨联芳认为，“四民皆工”由此完成了向“工人阶级”的语义嬗变。^⑦这个过程与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等革命先驱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是合一的。“四民”思想的演进过程，也就鲜明地体现了群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结合的便利性。

第四，由“天下大同”升华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天下大同”是中国非常古远而且绵延不

①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37、4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002页。

③ 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19，第311页。

④ 柳宗元《视民诗》，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将其称为“四民合作”（《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第1384页）。参见郭华清：《从〈柳文指要〉看章士钊的“四民”合作思想》，《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⑤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986页。

⑥ 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64页。

⑦ 李双、杨联芳：《“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变》，《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2期。

绝的伟大思想传统, 尽管就其思想起源而言, 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相去甚远, 但“大同”思想在几千年间不断升华, 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孔子崇尚的“大道”就是“天下为公”, 《礼记》中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愿景; 历代志士仁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同”像灯塔一样, 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直到近代, 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大同主义”, 作为东方的“大同”理想, 明显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 二者虽不能等同, 却可相通。因为“天下情怀”是相通的, 不过是在理想社会的界定和实现路径的科学性上有所不同。

以上四个基点, 仅为显例。其实,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的理论基点很多。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 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此, 社会学中国化要想迈进自主创新的新阶段也必须如此。

三、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必须以群学古今贯通为本土学科基础

社会学中国化, 直接拿西方社会学联系中国实际不就可以吗, 为什么还要以群学为基础呢? 的确, 即使不以群学作为学科基础, 社会学在中国也不见得绝对不能发展。但是, 不以群学作为学科基础, 还想要建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往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没有证明具有这种可能性。不是不需要拿西方社会学联系中国实际, 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 但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 这远远不够。为什么? 因为没有本土的“根”, 总归不过如浮萍, 无法长成大树——“‘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 也就不能实现“彻底中国化”。

中国社会学的“根”在哪里?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 必有无比丰富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认识, 确认“中国本有社会学”, 找到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起源, 理论自觉才有扎实的根基。

(一) 群学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根脉

不论从学理基础、话语特征还是未来发展来看, 都表明群学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根脉。

第一, 就学理基础而言, 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之学, 其中包含着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密码。两千多年来, 群学与中国社会同频共振, 与中华民族命运与共, 与人民生活水乳交融, 其作为贯通古今的强国富民之学、社会兴盛和良序之学, 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而且尤其适合当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 靠的是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 这就需要合群; 必须处理好人伦关系、义利关系, 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这就需要能群; 必须处理好家国关系、形成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 这就需要善群; 必须秉持“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理念, 追求“群居和一”, 这就是乐群。合群、能群、善群、乐群是社会存在和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第534页。

^② 《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 新华网,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23/c_1127243217.htm, 访问日期: 2025年2月20日。

展的“公理”。

第二，就话语特征而言，群学具有丰富的本土化概念、命题和理论，这是“社会学中国化”天赐的历史资源。笔者的研究团队于201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2019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六卷本）梳理出了群学2200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题体系，充分证明了群学概念、命题和理论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在实践上的适切性和有效性。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群学在战国末期形成了元典相态、秦汉时期形成了制度化相态、隋唐宋时期演变为民间化相态、元明清时期演变为心性化相态，到了近代又呈现为转型相态，包括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崛起，每一时期都创新了大量概念、命题和理论，^①其本身的绵延力、对社会的解释力、对心性的塑造力以及对变革的适应力都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就未来发展而言，群学一向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符合“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的需要。费孝通指出，成熟的社会学应该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社会学。^②群学从来没有造成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对立，坚持二者的统一是一以贯之的，这是尤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堪称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元典。西方社会学虽经长期发展，但仍未形成“成熟的‘学’”^③，这与其二元对立思维造成的实证与非实证、经验与理论、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割裂和矛盾，关系极大。怎样才能突破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费孝通20多年前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④

（二）中国现代社会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群学实行“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有人可能觉得，传统遗产虽然宝贵，但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要往前看，科技突飞猛进，社会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何必回过头来眷顾包括群学在内的传统文化？

1. 就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实行“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

的确，社会学的发展应该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守旧”，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发展，走向未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所谓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进化主义逻辑确实区别很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恰好相反。中国文化传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⑤，古往今来，尽管不乏保守、守旧之人，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求新的文化。这种求新的文化不仅与现代性相适应，还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动力之源。

2. 就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实行“第二个结合”尤为紧迫

当前，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大模型、“百模大战”，层出不

① 参见景天魁主编《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群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二卷“群学制度化”、第三卷“群学民间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第四卷“群学心性化”、第五卷“群学转型”、第六卷“中国社会学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②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438、464页。

③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464页。

④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464-465页。

⑤ 杨天宇：《礼记译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803页。

穷,必须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为了应对新的风险和挑战,社会学有必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归根结底,科学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科学技术要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科学技术。人要驾驭科学技术,用什么来驾驭?要用人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费孝通讲的“道义秩序”,而社会学就是道义秩序之学。社会学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帮助人去驾驭工具的,不是帮助工具去役使、奴役人的,那样的“社会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了。社会学在本质上应该如潘光旦所说,是“人化的社会学”^①,是人伦的社会学。所以,恰恰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剧烈变化要求社会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能够管住科学技术的,是人心。人心普遍向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就是光明;人心普遍向恶,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就是黑暗。从这里可以理解群学强调修身为本,修身端在修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刻含义。

3. 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个结合”具体“结合”什么?最直接的就是群学的贯通和传承。对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群学,康有为曾经感慨:“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②有些人见到谭嗣同曾用否定的口吻说过类似的话,^③就对这个论断有所怀疑,其实这个论断说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既然有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有群学发展至今2200多年悠久的历史积淀,这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学科史基础,我们当然要如梁启超所说:“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④作为有五千年文明滋养的中国学者,不但有现实责任,还有历史责任;不仅要有现实担当,还要有历史担当;不但要对得起后辈,还要对得起祖宗。偌大一个中国,恢宏的中国学术,宏富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值得研究、需要继承的。

群学作为根脉,是我辈必须继承的传统。传承群学,是我辈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历代学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情理上的虔诚和奉献的一面。因为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是自己的血脉,它是祖宗传下来的家业、家产,自然有一种归属感、亲切感、责任感乃至神圣感。因此,我们要继承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增强“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意识。

中国学术传统是“经世致用”。“经”有多个含义,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上下贯通”,包含着通古达今之意,也就是贯通历史与现实,亦即“让历史照见现实”,从历史理解现实和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⑤。

(三) 如何以群学古今贯通,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在“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如何具体着手?建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主要应在概念、命题和理论上多下功夫,这里只讨论与话语体系相关的几个要点。

一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着重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提炼概念和命题,由此入手,引领实现社会学“彻底中国化”。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虽然比马克思主义社会

① 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59页。

②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1896年)》,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86页。

③ 谭嗣同:《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67页。

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页。

⑤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学略早一点,但是其与群学的结合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结合那样直接和快捷,其会通的程度和效果也没有后者那样具有紧密性和实践性,特别是在实践性上差别尤为明显。西方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始,就更倾向于占领讲堂和学术场域,更满足于解释社会,不长于改造社会,而群学扎根民间,深入人心,更贴近日常生活和工农群众的基本实践。以往的百余年间,看起来群学罕见于讲堂,被排斥在所谓“纯正的社会学”之外,但由于其扎根于中华本土,实际上沁入人民群众的观念中,呈现在从个人修养、人与人的关系到家国关系以及国际交往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之中,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就要从中国人民的丰富实践中大量提炼更接地气的概念和命题,形成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二是不被西方社会学的话语体系束缚,从群学概念术语的实际内容出发,以“实”定“名”,由此着手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文明的多样性既包括社会内容的多样性,也包括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大千世界,五彩缤纷,自诩“纯正”的褊狭态度,有碍于社会学的丰富和发展。认识到概念术语只是表达社会内容的工具,既不能决定学科有无,也不能决定学科优劣,这样才可能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才可能掌握真正的话语权。潘光旦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一词,并不意味着没有关于“社会”的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当然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不称“社会”,而名之“群”,尽管与西方的“社会”概念可能有所差异,但所指代的对象大体相同;中国当然有关于人与人如何相处的思考和研究,不但有,而且还很丰富;不但丰富,而且有很多科学的成分,尽管不称“社会学”,但是有与之相类似的学问。不论名之为“群学”还是“伦学”(潘光旦的主张),相当于“社会学”的学科内容之实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我们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社会学”这个名称,就断言“中国本无社会学”,还是依据中国古代确有相当于“社会学内容”之实,而承认“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是让“社会学”与“群学”的译名不同来决定学科内容的有无,还是让学科内容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学科的有无?

中国古代没有“群学”之名,这个学科名称是康有为、严复、刘师培等人在接触西方社会学之后,发现群学的实际内容与西方社会学相当类似,才将荀子创立并延续了2000多年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名之为“群学”,并将群学认定为中国社会学;中国古代没有“群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称谓,是梁启超在认定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正同”之后,才称荀子为“社会学之巨擘”^①,1935年到燕京大学讲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也称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个学科”^②,20世纪80年代卫惠林肯定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钱钟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已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之后仍坚持使用“群学家”的称谓,显然是认为“群学”比“社会学”更适合中国。这些前辈学者为什么明明知道中国古代并没有“群学”“群学家”之名,却坚持使用这种称谓?是他们“外加”的吗?表面上是,其实不然。群学(中国社会学)的实际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群学”之名是从历史存在的实际内容中“引”出来的,是根据充分、实至名归的。同样,称那些创立和延续了群学的人物为“群学家”也是名副其实的。

如果说哪个是“外加”的,“社会”和“社会学”才真正是“外加”的,其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的,中国古代本来没有作为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一词,假如潘光旦所主张的,清末民初就把“sociology”翻译为“伦学”,或者一直沿用严复的“群学”译名,那今天就不会有所

①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15,第1317页。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32、244页。

谓“外加”之说。

退一步说,即使是“外加”的,也是可以的,在学术上是常见的。中国古代没有“哲学”“逻辑学”“经济学”等名称。比如“哲学”,就是胡适、冯友兰率先从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思想宝库中,梳理出了与西方哲学相当的思想体系,名之为“中国哲学”。对此,世界哲学界除了少数西方中心主义的顽固坚持者之外,早就普遍承认了。能说“中国哲学”是“外加”的吗?名称是外来的,思想内容是本有的,再说“外加”就没有意思了,或者说这种“外加”是中西之学相会通的正常现象。不仅如此,应该说,没有必要纠结于谁是“外加”的。王国维说过,学问“无中西也”^①,重要的是中西之学相互承认、相互借鉴,平等对话,互促发展。

冲破西方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束缚,不难发现中国本土概念、命题具有更为适切的表达力和更为地道的解释力,尤其是那些能够历经岁月磨砺和实践淬炼,仍然延续下来的古典群学概念和命题,一定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是弥足珍贵的。只有纠正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盲目崇拜,丢掉“言必称希腊”的旧习,依靠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主。

三是要破除西方近代所谓“划分学科的标准”之羁绊,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观念中解放出来,正确看待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异同,由此着手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如果说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有区别,但“区别”不等于“有无”,有所区别就一定能决定学科有无吗?美国社会学与欧洲社会学也有区别,为什么都可以称为“社会学”?中国与西方是两大文明体系,其关于“社会”的认识及其使用的名称不同、学科分类方法不同,为什么就不能承认群学也相当于(西方)社会学?如果不是只承认西方划分学科标准的唯一合法性,不是遵从西方中心主义,承认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还至于那么困难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刻含义,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对于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绝对必要的。

前面提到,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学“在解放前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先天不足”,应该指的就是还没有找到或承认中国本土的学科史“坚实的基础”。王宁认为,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虽然做出了很大努力却成效不足,是因为“知识创新力不足”^②。现在看来,不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精华的群学,难以得到几千年文明积累的丰富营养,创新力如何能足?只有靠群学的古今贯通,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滋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社会学的“知识创新力”。

四、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必须以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会通重构学科体系

在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要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直面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由于西方知识体系长期居于一家独尊的地位,如何处理这两大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正确对待的重大问题。问题虽然重大,但好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两大体系长达120多年的相处经验,证明了用西方社会学取代群学不仅难以建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时也不利于西方社会学的丰富和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否就要反过来用群学取代

^①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国学丛刊》1911年第1期。

^② 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西方社会学？那也是不正确的。社会学要“彻底中国化”，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实现崛起，就必须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壮大自己。所以，群学与西方社会学要会通而不是取代，综合融通是重构学科体系的基本原则。而群学本有这样的综合融通的传统，可以称之为“融通主义”。融通主义是群学之魂，作为群学要义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基本旨趣是融通，根本原则是融通，实现路径也是融通。^①这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具体地说，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会通的融通主义原则包括以下三点：

（一）会通的前提是平等相待

学术上的“平等”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平权，是指在学术上要相互尊重，见人之长，克己之短，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然而，如果说“平等”意识在学者个人之间主要是学风问题，那么，对于中西两大学术体系来说，“平等”与否却是客观情势起着强制作用。20世纪20—40年代，学术大势是西化风潮一边倒，中国传统文化被斥为落后的，甚至是愚昧的，处于被批判、被清算的地位。强势传入的西方社会学对群学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在“西化”思潮裹挟下，“中国本有社会学”的共识不幸反转为“中国本无社会学”的“定论”，^②哪里谈得上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地会通？即使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西方式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模式仍有长期影响力。按照这种思维定式，群学既然是传统的，就应该被取代；西方社会学既然是现代的，就应该被全盘接受。所以，“平等对话”实际上也难以实现。

现今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群学命运的大逆转时代到来了，与西方社会学开展平等对话的机会历史性地提供给我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经验是宝贵的；西方社会学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西方现代化经验的结晶，是很珍贵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我们主张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来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绝无排斥西方社会学的意思。但是由于西方社会学只是对有限时间和地域内的有限经验的总结，而世界文明是多元的，现代化绝非只有西方这一个模式，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有多条，我们必须创造适合中国的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这就决定了西方社会学不足以回答中国的所有问题，不应取代包括群学在内的本土学术资源，更不能减轻我们创造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二）会通的方式是互学互鉴

具备了平等意识和平等关系这个前提，才可能有中西会通的正确方式，那就是互学互鉴。平等原则与互学互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学中国化”的实际效果，甚至“化”的主客关系还会被颠倒。当年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初衷是看到了西方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因此要把西方理论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可见，“化”的对象是西方社会学。西方社会学如果有这种自觉意识，它应该自己主动“化”自己，那才谈得上“服务于”中国实践。但是，由于缺乏中西学术的平等意识和平等关系，其具体行动只是西方理论“化”中国实际，其结果是西方社会学“化”中国，而不是根据中国实际“化”西方社会学，这就与“中国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在中西会通、互学互鉴方面，费孝通取得的创新性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费孝通除了创造了

^① 景天魁：《社会学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涵》，《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1，第3页。

闻名遐迩的“差序格局”概念,还提出了关于“乡土中国”的一系列概念;改革开放以后又提出了城乡一体、工农互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民的社会学”、“生态”与“心态”、“美美与共”的人类道义秩序等概念和命题,都是中西会通、相互借鉴,基于中国实际“化”西方社会学的优秀成果。

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学人在“社会学中国化”事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无意全面评述“社会学中国化”的以往历程,只是想论述其“新阶段”。即便上述评论的目的也不在评论本身,而在论述“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的发展路径。总体上看,我们要充分肯定以往“社会学中国化”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是其历史过程的继续和发展,当然也包含着费孝通所说的“改造和创新”。

其实,如果没有观念上的偏执,作为中西会通方式的互学互鉴未必多么困难。因为诚如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等先贤所一致认定的,荀子创立的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暗合”(严复语),在学科分类上“正同”(梁启超语),二者可以“合观”(章太炎),学科内涵相似(蔡元培),学科属性相合(刘师培)。既然如此,他们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社会学时,就致力于以中国本有的群学与之对话和会通,也就是“化”西方社会学理论。严复的《群学肄言》就是用中国概念语言、着眼于中国社会进化和变革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重写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这无疑是揭开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会通”的序幕。今天,沿着这条会通之路,实现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会通,就可以建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对西方社会学而言,与群学互学互鉴同样重要。只有会通,才能接地气,才会更有解释力。况且,中西学术之间,本来既是东中有西,也是西中有东。^①直到18世纪的欧洲,从思想家到平民,都普遍认为中国是他们学习的榜样。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②。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莱布尼茨等都崇拜并积极吸收中国文化,17—18世纪的欧洲流行的是“东化”。中西文化关系的大逆转发生在19世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疯狂扩张造成了西方文化霸权。这才有了西方对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发明权、话语权的垄断,才造成了西方社会学唯我独尊地取代群学。

然而,总想取代他者的褊狭心态,导致西方社会学失去了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大好机会。试想,如果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能够承认群学,借鉴群学,看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总不难从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找到与群学概念和命题的结合点,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最起码也可以借助群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获得亲近感,这应该有助于西方社会学本身的拓展。

其实,中西会通,一方面可以使群学实现现代转型,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西方社会学适应中国社会实践需要,这是互鉴互促的,若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结果只能是双输。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互学互鉴都是中西社会学两大知识体系

^①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包华石主讲:《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第38页。

^②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沙迎风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第203页。

唯一正确的相融之道。

（三）会通的目的是博采众长，重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平等相待的态度、互学互鉴的方式，都是中西社会学会通的条件、途径和手段，这在中西会通的任何阶段都是要始终坚持的。谈到会通的目的，就必须明确，这不是做一般的交流和沟通，而是要在“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通过博采众长，达到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的。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社会学，不用说中国社会学，就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也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西方中心主义者宣称西方社会学是“唯一的”“普遍共识”，可是他们自己也拿不出一个“唯一的”社会学范式，且不说国与国之间，就连一国内部也是门派林立，何来“唯一”？为什么中国人就要尊西方社会学为“唯一的”“正统的”范式呢？那样做，除了迷失自我、丧失自主性之外，其实既无助于西方社会学发展，也无益于中国社会学发展。

西方中心主义者声称西方社会学具有唯一性，这既没有事实根据，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任何普遍性都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对于社会学这种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双重属性的学科来说尤其如此。归根结底，任何一种社会学都不可能脱离由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基础，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答其所处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更不必说任何一个或一批社会学者都必然受到其所处时空条件下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只有踏踏实实地立足于本土，既赓续传统，又直面现实，才能真正获得学术自立和自主。

五、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

必须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造多元融通的世界社会学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讨论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那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

（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社会学中国化提出了强烈的也是更高的要求

费孝通在谈到他致力于创新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创见，很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相结合的产物。”^① 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如此。我们既有群学悠远的“历史传统”，又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形势”，将二者相结合，确立真正的学科自主则势不可挡。

当今，我们之所以笃定进入了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迫切需要。如果是搞西方式现代化，那群学便难以适应，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群学有天然适配性。中国式现代化为“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百多年来，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适配性是有限的。西方率先步入现代化，西方中心主义就把“一种模式”渲染为“唯一模式”，以此独霸关于现代化的话语权。以往，中国人也曾把西方式现代化当作普遍追求的目标，要求中国文化适应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的否定和批判，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适配问题总是解决不好。如今我们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适配性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65页。

就理顺了,从而解决了历史上的错配问题。

不仅如此,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之后,问题就反过来了:过去是问,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配西方现代化;现在是问,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否适配中国国情?西方社会学是否适配中国实际?它在什么意义、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才能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审查者与审查对象“移位”了,我们成为鉴别者和审查者了,有话语权了,这是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鉴别和审视西方社会学,看看哪些概念、命题和理论可以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中西会通”。当然,也要审视群学,看看哪些概念、命题和理论适合当今中国实践的需要,这就是“古今贯通”。很显然,越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就越是需要中国本土的群学;越是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越要重视群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必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学。

(二)“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要回答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正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样,“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是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为形成“人类道义新秩序”^①、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西方现代化是“小众现代化”“排斥性现代化”,进行了二百多年,仍然把世界80%以上的人口挡在现代化大门之外;中国式现代化是大众现代化、包容性现代化。只有放眼世界,胸怀天下,天下为公,心中容得下全世界人民,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和民族,才能促使世界社会学形成百花争艳局面,从而完成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学术历来就有天下视野、天下情怀,不是偏于一隅的褊狭之论。正如钱穆所说:“诸子百家中,尤其是儒、墨、道三大派中,有一点是他们互相会通合一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他们的思想对象都是全人类的,把全体人类作为他们思想的对象,那又是极够伟大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产生的文化中间的大理想是以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为对象的。”^②我们讲“中国化”,绝不能局限于中国,要胸怀天下,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必须回答世界性问题,才能实现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

社会学新阶段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费孝通早在1992年就提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③他指出,在这个世界,“关键是全人类已有了利害上的联系但却还缺乏道义上的认同”,而“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的层次而没有道义的层次。没有比当前的世界更需要一个道义的新秩序的了”。正是从这一胸怀天下的大格局出发,费孝通强调要研究荀子群学,因为群学聚焦于研究人与人的道义关系,在“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也许“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号召世界人民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⑤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一名澳大利亚记者采

①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258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九州出版社,2011,第38页。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页。

④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第258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第48页。

访时说：“如果超过 10 亿的中国人也过上与澳大利亚、美国人同样的生活，那么，全世界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因为地球会无法承受。”^① 奥巴马之论露骨地显现了其对中国的“理解”是傲慢的，西方现代化在视野上是狭窄的，心胸是狭隘的，根本没有中华文明那样的包容全世界人民，愿意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伟业的“天下”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他强调：“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中非要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② 这种胸怀和气度与满嘴“平等”“人权”实则剥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权利的西方政客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中国社会学不是“小众社会学”，而是“大众社会学”，^③ 群学一以贯之地以融通主义为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按照这个逻辑，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朋友、对手甚或敌人，也不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经验，凡是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益有用的优长，都借鉴之、吸收之，实行大综合、大融通，这是融通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④

（三）实践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力量，一切以实践为检验标准

所谓“科学”就是要讲究“客观性”。实践的结果、历史的结论就是我们作出判断的客观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再纠结和争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古今统一还是古今断裂了。我们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就以实践为唯一标准，不论古今、中西，凡是对中国成功的实践有解释力的就吸收，没有解释力的就舍弃。古代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今天还有解释力的，就继承；西方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对中国确实有解释力的，我们就借鉴，无所谓孰为“体”孰为“用”，正如王国维所言，学问本无中西。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成功实践给了我们底气，给了我们自信，也给了我们最基本的方法——实践检验法。

六、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学科自主

迈进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创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学科自主。为此，就必须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禁锢，抛弃其思维定式。必须明确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学术思潮和倾向，其产生的根源及学术霸权的底气，与其说来自西方在科学上的成就，不如说更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在全世界疯狂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掠夺。其主要原因正如阿里吉等指出的：“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

① 《奥巴马：超 10 亿中国人过美国人生活 全世界都将很悲惨》，凤凰网，https://phtv.ifeng.com/program/sslld/detail_2012_02/14/12504814_0.s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2 月 20 日。

②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6 日第 3 版。

③ 景天魁：《迈向大众社会学——追寻中国社会学的品格塑造》，《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④ 景天魁：《社会学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涵》，《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4 期。

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① 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等学者也都指出,西方崛起与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主义奴役和贩毒是同一过程,^② 这是作为西方霸权表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根基,而西方中心主义也是文化殖民的精神武器。

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学科自主的关键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这种束缚,往往很难察觉,在我们接受一些广为流行的“定论”的同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就隐含其中了,这主要表现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之中。

其实,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来就不是“纯学术”过程。

无论是1914年2月美国学者葛学溥在沪江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还是1923年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步济时在燕京大学创办社会学系,都是为了用基督教争夺中国青年学生。步济时就行明言,学术研究不应该与学校的实际功能(传播基督教——引者注)和跨文化宗旨(文化殖民——引者注)相分离。^③ 简而言之,就是文化殖民。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初衷,本来也很明确,那就是消除“文化殖民”,建设“‘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可惜的是,民国时期的吴文藻等前辈,只能做他们可能做的事情;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过程也表明,要真正消除文化殖民心态,增强对本土学科自信,跳出“主体性危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要真正增强学科自信,需要实践基础。

增强学科自信,要靠学科本身,要靠学者的自觉努力,但归根结底还要靠实践的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群学的中西会通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基础,其中的道理郑杭生已经讲清楚了:中国的人口规模、广阔地域和五千年文明传统,“这三大要素构成的中国是不能被西方小国理论所解释的”^④。这种话,有人听了可能不舒服,有人甚至指为“自傲”。但在认识论上绝对是有根据的,用“复杂”去解释“简单”,才能解释透彻。如果反过来,用“简单”解释“复杂”,用浅显解释高深,用短暂解释久远,自不量力,只能借助于主观臆测,那才是真正的“自傲”。

当然,我们对群学的自信并非仅仅依靠荀子个人,荀子是先秦诸子之学的集大成者;我们对群学的自信也并非仅仅依靠群学元典。群学自战国末期诞生以后,经过秦汉时期的制度化、隋唐宋时期的民间化、宋元明清时期的心性化,再到近代转型,^⑤ 绵延两千多年,遂成为解释中国历史和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的密码。群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瑰宝,是中国社会学必将崛起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历史根基,也是为当今和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启迪的重要智慧源泉。我们非常重视西方社会学,对于中西社会学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必要再陷入所谓“体用之争”。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社会学也就罢了,既然我们有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深受中华五千年文明滋养的中国社会学学人,为什么不珍视本土的社会学根脉,何必甘受

① 阿里吉、滨下武志、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马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33页。

②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第442-443页;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61页。

③ 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程龙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50页。

④ 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⑤ 参见景天魁主编《中国社会学史》,该著共6卷,分别于2019年、2022年、202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就连许多欧美学者都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莫说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即使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相比，中国人今天的文化自信是大大增强了。1997 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2009 年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2019 年笔者提出“学科自信”^①，2021 年洪大用提出“实践自觉”^②，同年李友梅提出“社会学研究新自觉”^③。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倡导自信、自觉，反映出社会学界的自主意识和自觉精神空前增强了。可以坚信，待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再来看中国社会学，其植根于学科本土，根深、树壮、叶茂，既有普遍性，也有鲜明特色即个性。否则，如果主要的概念、命题和理论都是西方社会学的，那不过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就像攀附在西方社会学大树上的藤萝，只有依附性，没有自主性，严格地说，仍属于西方社会学（推广和运用）的范围，难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因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既然标示为“中国的”，那么，就是生长在一定地域内的，但从学科性上说，指的不是“地域性”，而是“自主性”。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化殖民情况下的地域性，就是没有自主性的。

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具有三大标志：一是自己的学科根脉，这才有“自主”的底气；二是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才有“自主”的资格；三是应有的学术担当，这才有“自主”的地位。

由是观之，“社会学中国化新阶段”就不仅仅是如何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而是确立社会学的自主性问题。同样，群学的现代转型，是为了复兴群学，而不是取代群学，把群学由“本有”转为“本无”，转向消失，归根结底是要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实现群学复兴，即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

责任编辑：王晓习

① 2019 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学科自信：走进世界的中国社会学”讨论会上提出“学科自信”，后以《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义与实质》为题目，发表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② 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

③ 李友梅：《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

Advancing to a New Stage of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Jing Tiankui

Abstract: The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should transit from merely applying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to "connecting with Chinese realities" to a new stage of establish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 rooted in Chinese realities. The main implications of this "new stage" are as follows: clarifying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Chinese sociology, affirming that "Qunxue" (the study of groups)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ology, and building a sociology that is tru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soil";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thorough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 To advance into this new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1)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 wit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sociology; (2)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indigenous discipline by integrating ancient and modern Qunxue; (3) re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by harmonizing Qunxue with Western sociology; (4) addressing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creating a diverse and integrated global sociology. In essence, advancing into the new stage of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establish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ociology hinges on enhancing historic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disciplinary autonomy.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Qunxu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Marxist sociolog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autiful Jil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Jilin

Huang Chengliang, Wu Yonghua, Han Zhe, Li Yuting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the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guide and practical guideline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Jilin holds a position of utmost importance within the grand blueprint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conducted four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visits to Jilin Province. During these visits, he deliver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speeches and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Jili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how to create a green development path with distinctive Jilin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valuable document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rectives regarding Jili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a Beautiful Jilin under the guid-